

# 扎根时代生活 一个“好”字,涵盖多少代电影人的努力

##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的重要美育思想

本报记者 张焱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充分肯定了美育工作的重要性,对美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系统、深入的要求。具体而言,阐明了一个新的思想,肯定了三个以往的工作重点,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以往的讨论中,包括美术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和美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把这个问题表达得很清楚了——两者之间是母子项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存在质的差别,即包括美术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艺术教育培养的是德艺兼备的艺术工作者,而社会主义美育培养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也应道德修养与艺术素养兼备。

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美育特点,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的重要美育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重申了这三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美育工作的关注以及对推进美育工作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

扎根时代生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美育工作”提出的两个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既包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之间的不平衡,也包括社会高雅艺术产品供给与人民审美接受能力之间的不平衡。直观当下,艺术市场中搞怪猎奇、趣味低下、制作粗糙、内容浮浅、创作雷同、一味强调感官刺激,满足人一时耳目之娱的“艺术产品”不在少数,孔子所厌恶的“紫之夺朱”“郑声乱雅乐”(《论语·阳货》)的现象依然存在。其肇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艺术供给侧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侧方面的原因。按照经典接受美学的理论认识,“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艺术市场语境中,作为受众的人民对艺术作品的主动接受与消费,为艺术作品的创作、传播提供了动力,从而让艺术作品更有生命力。从艺术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当下艺术作品的品质、风格等也是受众接受和消费的结果。不仅对艺术作品如此,对创作者也是如此,“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此番讨论,我们会发现“加强美育工作”“扎根时代生活”至少具有两重深刻含义:一是艺术创作者要扎根人民火热的生产生活,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进而创作出有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具有高美育价值的精品艺术;二是艺术工作者要扎根人民的精神生活,开阔人民的审美眼界,提升人民对精美艺术的鉴赏、品味与享受能力,让欣赏精品艺术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期待与刚性需求,引导人民过上高尚的精神生活。同时,人民对高尚艺术消费的普遍需求会成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赋予艺术家创作灵感,从而不断创作出“三精合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造就一个文化鼎盛的辉煌时代,再塑一个尚美崇德的高贵民族,建成一个强盛文明的礼仪之邦。

“中华美育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回信中提出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新概念。我们认为,它应包括“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的“四教”思想,包括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教育观念,以及近代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等。这一概念的现实意义在于,提出了“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思想,我们认为其必将成为改进我国美育工作,推动美育实践发展的思想指引与行动指南。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在中国美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信中提出“扎根时代生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等观点,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美育教学”,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之后,关乎我国美育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指导性思想。准确把握信中提到的重要美育思想,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美育工作、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系统深入地研究和阐释信中提到的重要美育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学理逻辑,是完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育体系的时代课题。

(作者系文艺学博士,副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美育研究中心秘书长)



美育工作从娃娃抓起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谢晋曾说,拍电影就是掬一捧水,漏一滴再漏一滴,漏着漏着就漏光了。68岁的张艺谋经常在片场说起这句话。这是他“爱较真”个性的生动注脚。

在磨砺五年的历史题材影片《影》上映之际,记者专访了这位爱较真的导演,听他说那些与电影有关的故事。

### 匠心

《影》讲了一个替身的故事。平遥州从小被囚禁于密室之中,使命是在危急关头,替容貌似自己的大都督子虞挺身而出。“影子”是否真的甘心于此?子虞的妻子小艾,游离于真身和替身之间,她内心又有如何的挣扎?扣人心弦的情节就此展开。

张艺谋笑称,这部戏会聚了三个影帝——王千源、邓超和他自己。三十年前,让张艺谋拿到影帝的作品是吴天明导演的《老井》。为了将主人公演好,他花了两个月体验生活,每天早、中、晚各从山上背150斤左右的石板下来;为了找到被困井下三天的心理感受,他三天没吃一口东西,体会到百爪挠心的饥饿感。正是这种用心体验,让张艺谋的表演充满质感与力量。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爱挑自己的毛病。”张艺谋介绍,《影》用了五年时间打造,迟迟没有完成,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档期的问题,“那个镜头、那一句台词,你再多注意一下,再清醒一下,结果就会不同”,《影》就是这样被精雕细琢了五年。

张艺谋精益求精的性格,给团队成员以巨大的压迫感,也让会聚在他身边的人都呈现出格外敬业的状态。

“戏疯子”邓超在影片中分饰境州、子虞二人。拍摄期间,邓超为了展示境州强健的体魄,短时间内增肌20斤,境州的戏份结束后,为了变身羸弱的子虞,他又在两个月内迅速减重40斤。因为过度节食,他在片场几度饿晕。女主角孙俪,每天拍摄十多个小时后,还刻苦练古琴。青年演员关晓彤,不用替身在泥水中摸爬滚打,也让观众十分感动。

年纪变大是否会柔软一些,放松一些?面对这样的问题,张艺谋的回答没有一丝迟疑:不会!

“40年前,我们刚入行时,能看到多少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懵懂的。”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愿意吸收,你完全可以看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影片。”追求完美的性格,让张



电影《影》海报

艺谋时常对自己不满,有时他觉得才华不够,灵感不够,所以这些年来,他时刻保持旺盛的学习欲望。如今,68岁的他,未见一丝疲惫和自满,岁月似乎只是为他增添了持重与通透。“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 突破

张艺谋在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尝试与探索。他的尝试和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外界对他的评价也未莫衷一是。“别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是太在乎那些。”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电影的挚爱,似乎只有电影才让他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

《影》的一大看点是东方特有的水墨风格。在特效发达的今天,彩色调黑白易如反掌,但张艺谋一改之前色彩浓烈的画风,选择了低彩度的处理方式来构建影片的美学风格,去繁就简,将之书写成一幅完整的水墨画。

这样的选择,曾让出品人张昭为之捏了一把汗。从影多年,张昭深知其中的难度。然而,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有国外影评人这

样表述观影感受——《影》是一部极漂亮、充满感情的张艺谋式的动作片,这次几乎所有的服装、环境都是黑色、白色和灰色的,这并没有经过数字技术的增强,但他们确实做到了。

“每个中国导演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也都有一个水墨梦。当我们看到美丽景色的时候,会说‘美得像个水墨画’,这是中国人习惯的文化表达。但要把电影拍得像水墨画,技术上要跨越很多障碍。我是第一次尝试,不管完成度如何,它都很特别,可能过几年,人们说起水墨风的电影还会提到《影》。”谈起《影》这部特别的作品,张艺谋流露出一丝得意。

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是张艺谋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们第五代都是拍民俗起家,那个时候意识上还不是很自觉,只是为了让电影呈现出最正宗的中国味道。”

除了表现形式,《影》内容上的突破也让张艺谋大费脑筋。“中国传统古装电影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很多,但我想让平民突围而出,所刻画了一个普通人在帝王贵族游

戏中的挣扎和困惑,生存和反转。”

《影》的故事来自朱苏进的剧本。原剧本讲述了三国时期周瑜、关羽和孙权之间的一段故事。把替身的故事放进去,逻辑上、价值观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和编剧李威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你一稿我一稿,接力创作了无数稿才定稿。”

影片充满莎士比亚戏剧的张力。“现在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我比较满意。因为从历史经验来说,一个平民替身,知道太多秘密,除非统治阶级网开一面,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张艺谋说,“怎么把他写活,写出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力量,从情理链条上是很费脑筋的。因为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结构,每一步都要符合逻辑,电影试映了很多次,看过的人都觉得这个结尾合情合理。”

### 人性

永恒的人性方能与观众产生共鸣。这是电影的规律,更是艺术的规律。

在被问到《影》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时,张艺谋如此作答:“艺术最重要的是关于情感和人性刻画,这种对人性的呈现,未必和当下产生

立竿见影的联系,但几百年过去看莎士比亚的故事,依然会有共鸣,因为他就是在讲人性的复杂与挣扎。”

“拿境州这个人物来说,他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挣扎反抗、随机应变、求生意志乃至最后反败为胜掌控全局,你作为一个创作者,时刻要问自己,他会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人的隐忍,看到一个人的意志,看到一个人对爱情、权力、生存的态度,所有这些是人性,我想如果当代观众有共鸣,可能就在这些点上。”张艺谋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团队用了五年时间,不敢有一丝怠慢拍出来的片子。无论好与坏,都有我们的努力在其中。”

人性也是张艺谋观察电影行业的重要视角。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好,我们现在不缺钱,不缺观众,但缺好电影。一个‘好’字,涵盖了多少代电影人终生的努力与拼搏。”张艺谋说,“希望年轻导演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中,都不要粗制滥造,不要迷失自我,不要因为市场有需求就拍摄一些快餐式的东西,而要认真、严谨,每一秒都一丝不苟。”

# 粉丝集资追星,莫让“众筹”变“众愁”

□ 孙佳山 高寒凝

近期,随着一批粉丝偶像类网络选秀节目的热播,粉丝集资为偶像投票应援的现象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集资行为,因涉及金额巨大且时有诈骗案件伴生,一时间出现了种种乱象,并呈现出屡禁不绝的态势,亟待规范整治。

粉丝集资应援随着“粉丝经济”的产生而产生,是现代偶像文娱工业的产物。在我国,粉丝集资应援现象的大规模出现,大致始于2005年由《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所引发的追星热潮。当时,为了支持自己喜爱的选手,“超女”的粉丝们曾多次以集资方式筹得巨款,大量购入短信投票名额,帮助偶像不断晋级。同样是在2005年前后,韩国的一些娱乐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借助互联网,韩国娱乐行业将其成熟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我国,粉丝集资购买偶像专辑、电影票、向偶像赠送礼物等流行于韩国、日本的应援式追星方式,也由此在我国逐渐普及开来。通过百度贴吧、微博、微信群、Owhat等互联网平台发起的集资应援行为,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非线下应援活动可比。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本土

的“粉丝经济”,在不知不觉中崛起,形形色色的粉丝集资应援行为,早已遍布各种粉丝群体的应援活动中。粉丝应援的本质是粉丝以众筹的方式,主动参与到偶像的运营活动中。这些应援集资行为通常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包含实物回报的,例如出售专辑、电影票或制作贩卖手机壳、照片等周边商品,将所得利润用于支持偶像的相关活动;第二类并不提供实物回报,但承诺将募得的资金用于支持偶像的相关活动,例如选秀投票、向偶像赠送礼物等;第三类便是以支持偶像为名义筹集资金,承诺提供若干实物或非实物回报,然而却并不兑现的诈骗行为。

在实际操作中,因集资平台的内部管理与资金规模并不相匹配,不少粉丝的集资屡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一些人敛财牟利的幌子,像上述第三类打着支持偶像的旗号,实则干着诈骗违法勾当的行为越来越多。例如,2016年,为了给日本某偶像团体成员投票,就有粉丝在百度贴吧等网络社区筹集数百万元人民币,然而最终投票结果却与所筹款项存在较大出入,组织者被怀疑假借投票,影响极其恶劣。

而在近期结束的某粉丝偶像类网络选秀综艺节目中,某选手的粉丝为了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给偶像投票,通过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共筹得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资金,可投票后却仅能提供十余万元购买视频网站会员的票据。类似的案例近年来数不胜数,涉及金额或大或小,一些案例引发一定的关注,但多半不了了之,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也很难追回。

粉丝集资参与应援活动,之所以会陷入监管和维权的双重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类粉丝应援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如百度贴吧、微博社区、微信群、Owhat等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组织者具备一定的匿名性,追查其真实身份需要借助公安机关,维权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此类诈骗的受害者中,通常存在着相当比例的未成年人,他们在受骗之后一般不愿声张,即使试图报警,通常也不了解正确的维权渠道。

针对当前这种扭曲的现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诈骗行为,给出具体的惩治依据,并向受害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提供清晰明确的举

报渠道和必要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应规范粉丝参与的偶像形象运营活动,对于能够主动公开应援账目、明确资金流向和具体使用情况的粉丝团体和艺人,可通过颁发行业性的荣誉奖励予以充分肯定,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专门为粉丝应援活动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对相关诈骗行为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近期发生的几个案例显示,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非但未有效遏制相关诈骗行为,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屡屡援引“避风港”原则,声称自己只是提供了网络服务,不应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这种将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粉丝的说辞很难站得住脚,因为这些平台从粉丝的应援集资中获利巨大,所以不能只获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电商平台对假货负有甄别责任,网络出行平台对网约车司机负有管理责任,第三方众筹平台同样应对粉丝应援活动中的资金流向负有监管责任。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粉丝与偶像间的高频互动提供了便利,也令双方关系中的“伴生”属性加强,如今一些粉丝不只是崇拜偶像,也更期待与其“共同成长”,期望通过自身贡献在粉丝群体中获得认可,这是粉丝文化、追星文化在网络时代的新表现。正是这种文化为粉丝应援活动中的诈骗活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也呼吁追星路上的粉丝,应该少些疯狂,多些理性,莫让集资追星路上的“众筹”变“众愁”。

(孙佳山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高寒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